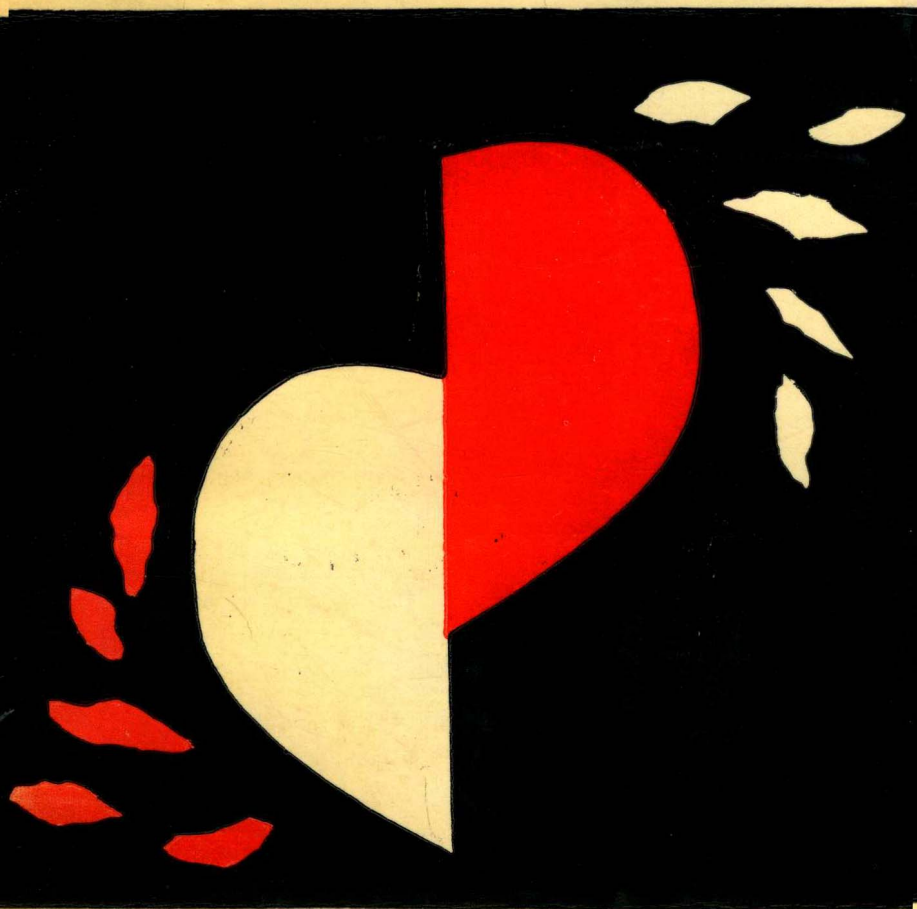


新时期小说研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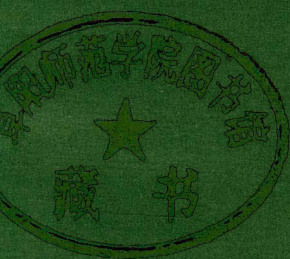
徐文斗 主编



爱神的重塑

——新时期文学中的情爱文化

李新宇 著



李新宇 著

爱神的重塑

——新时期文学中的情爱文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爱神的重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100866)

山东汶上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9.5印张 238(千)字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定价: 4.20元

ISBN 7-5043-1032-8/I·102

目 录

序.....徐文斗 (1)

引言..... (1)

第一章 新时期文学情爱主题的浮沉

与流变 (5)

一、历史的回顾：一个失掉了爱情的时代..... (5)

二、对爱情位置的呼唤..... (9)

三、爱神归来之后的政治反思..... (11)

四、从政治控诉到道德思考..... (18)

五、情主题向性主题的转移..... (25)

六、红帆的远去与爱神的陷落..... (35)

第二章 感情价值的增长与文明的呼声 ... (39)

一、婚姻基础的认定..... (39)

二、走出野蛮和愚昧的努力..... (46)

三、觉醒者的追求..... (53)

四、感情价值增长过程中的矛盾冲突..... (54)

第三章 永恒之梦的破灭 (60)

一、一个传统理想的动摇..... (60)

二、陈世美与秦香莲的当代命运..... (66)

三、离婚难的慨叹与反婚姻倾向..... (74)

四、神女峰的倒掉与挑战者的姿态..... (79)

- 五、对感情发展规律的探索……………(82)
- 六、《离异》的全面思考……………(87)
- 七、关于婚姻持久性的道德判断……………(93)

第四章 专一美德的危机……………(96)

- 一、从《在悬崖上》到《爱，是不能忘记的》……(96)
- 二、对婚外恋的理解……………(103)
- 三、对“第三者”的宽容……………(114)
- 四、面对形形色色的开放女子……………(124)
- 五、在最开放的行为背后……………(127)

第五章 从文明到自然的探寻与困惑

——性意识与爱情的粗鄙化……………(135)

- 一、一个长期被驱逐的精灵……………(136)
- 二、把人应有的还给人……………(146)
- 三、对本能力量的正视与探索……………(155)
- 四、对野性的赞美与对爱情原始状态的呼唤……………(165)

第六章 从天国到人间的回归与失落

——爱情的世俗化……………(171)

- 一、天国与人间的浮沉……………(171)
- 二、诗意的消逝与花环的枯萎……………(176)
- 三、“过分认真也是矫情”……………(183)
- 四、听命于生活的爱神……………(191)
- 五、一种选择所显示的困惑……………(197)

第七章 从赞歌到挽歌的深化与迷惘

——爱情的悲剧化……………(201)

一、大团圆传统的沉没与悲剧意识的强化·····	(201)
二、悲剧主题的发展与流变·····	(210)
三、走不出的悲剧圈·····	(215)
 第八章 女性美的艰难蜕变·····	(224)
一、女性美的失而复得·····	(224)
二、从冯晴岚到刘巧珍：传统女性美的高扬·····	(229)
三、从吕莎莎到安琪：女性美的现代转化·····	(238)
四、女性的思考与自我设计·····	(242)
 第九章 男性美的时代色彩·····	(246)
一、男性美与女性择偶标准的社会化·····	(246)
二、转折时期的理想男性·····	(250)
三、“寻找男子汉”·····	(258)
四、“男子汉”的内涵与男性美的嬗变·····	(261)
五、女性面前的一个矛盾·····	(276)
后记·····	(279)

引言

在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中，古希腊大戏剧家阿里斯多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从前，人的体形是一个圆团，每人有四只手，四只脚，头上有两副面孔朝着前后两个方向。他们可以随意向前或者向后运动。这种人体力非常强壮，精力非常旺盛，因此自高自大，连众神都不放在眼里。于是，众神愤怒了。众神之首宙斯为削弱人的力量而将人象切苹果一样一切两半。这就有了男人和女人。人被切成两半之后，这一半想念那一半，那一半想念这一半，总想寻找到自己的那一半而重新合拢在一起。

.....

印度《创世纪》中说，上帝取花的美丽，鸟的歌音，虹霓的颜色，风的柔态，水的笑容，羊的温柔，狐狸的狡猾，云的难以捉摸和雨的变幻无常，交织成了一个女人，送给亚当做妻子。亚当很快乐。可是，几天之后，亚当跑去向上帝说：“请你将这女人带走，我实在不能和她过了。”上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将夏娃带了回去。几天之后，亚当又来请求上帝：“请你将那女人还给我，因为我没有她不能生活。”上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将夏娃还给他。可是，几天之后，亚当又来了，他向上帝请求说：“你所创造的这个夏娃，仍请你收了回去，我发誓不能和她过下去了。”上帝又答应了他的请求，收回了夏娃。等亚当第四次来诉说没有那个女人便不能生活时，上帝仍然把女人还给了他……

我的一个朋友，流着眼泪向我哭诉丈夫的变心。当年，他们曾山盟海誓，永不变心，父母反对而无力阻挡。“永远爱你一个”的血书犹在，丈夫却已另有新欢，离家独居，要求离

婚……

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在一群青年男女中，甲男追求乙女，乙女又追求丙男，丙男爱慕的是丁女，丁女追求的却是甲男。这种追求形成一个圆环，大家都拼命追求，却谁也追不上谁。这时候，谁如果站住回过头来，谁就能得到爱情，但站住者却总是感觉有点委屈……

如此种种，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真是一个百思不厌、难以穷究的谜。

每一个正常的人都梦寐以求爱的幸福与甜蜜，“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为了爱情，人们甚至不惜献出宝贵的生命。可是，爱情给人的却并不都是甜蜜。爱情是上帝编织的迷宫，人类永远在其中转来转去，而难以了解它的奥秘，把握它的真谛。

也许正因如此，它总是吸引着人们去认识、去探索，一代一代，乐此不疲。

在对爱的探索中，文学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古今中外，文学大都离不开人类的情爱。文学因爱情而增添魅力，爱情因文学而更生光辉。从东方到西方，罗密欧与朱丽叶、林黛玉与贾宝玉……文学成功地表现着那个时代的情爱文化，同时又以独有的方式陶冶着人们的爱情道德观念和情操，影响着人们的情爱观念和情爱方式。

新时期文学对人的表现空前深化。爱情，作为人的生活的重要内容，必然得到深刻的反映。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开放的时代，传统观念正发生着急剧的裂变，民族文化正经历着一个扬弃、更新和重铸的过程。情爱文化也不会例外。情爱文化的裂变和重铸必然地在情爱文学中表现出来。

因此，考察新时期文学中的情爱文化形态，无论对于认识

人类的爱情，还是认识民族文化现状，都将是有益的。

新时期文学对情爱有许许多多的新探索，有形形色色的新表现。在进入讨论之前，我想起了恩格斯的两段话——

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性爱 特别 是在 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现存的实在的宗教只限于使国家对性爱的管理即婚姻立法高度神圣化；这种宗教也许明天就会完全消失，但爱情和友谊的实践并不会发生丝毫变化。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6页

维尔特所擅长的地方，他超过海涅（因为他更健康和真诚），并且在德国文学中仅仅被歌德超过的地方，就在于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假如我把《新莱茵报》的某些小品文转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面，那么读者中间有很多人会大惊失色。但是我不打算这样做。然而我不能不指出，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应当有一天公开地扔掉德国市侩的这种偏见，小市民虚伪的羞怯心，其实这种羞怯心不过是用来掩盖秘密的猥亵言谈而已。例如，一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的确就会想到，人们是完全没有生殖器官的。但是，再也没有谁像这位在诗中道貌岸然的弗莱里格拉特那样喜欢偷听猥亵的小故事了。最后终有一天，至少德国工人们会习惯于从容地谈论他们自己白天或夜间所做的事情，谈论那些自然的、必须的和非常惬意的事情，就像罗曼语民族那样，就像荷马和柏拉图，贺雷西和尤维纳利斯那样，就像旧约全书和《新莱茵报》那样。

——《维奥尔格·维尔特的〈帮工之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9页

这种伟大的思想家的科学态度将引导我们去正视和讨论一切常常羞于讨论的问题。

第一章 新时期文学情爱主题的

浮沉与流变

一、历史的回顾：

一个失掉了爱情的时代

新时期文学产生于一片没有爱情的荒野。它是从爱情艺术的废墟上起步的。作为文学历史流程中的一环，新时期文学直接承接的是“文革文学”。举世瞩目而且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把爱情从人们的生活中赶走，也把一切有关爱情的表现从文学中驱逐出去。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以政治宣传为最高职能。它直接抒发壮志豪情，演绎阶级斗争，以此鼓舞人们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热情，激励人们的斗志，摒绝一切与斗争无缘的人情味。作为一种特别的文化现象，“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表现重大题材而不屑于表现生活琐事。而所谓重大题材就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与斗争相比，谈情说爱不仅微不足道，而且因为它很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调”而受到批判。于是，爱情被“文化大革命”驱逐出它崇高而圣洁的理想国。爱情不仅在生活中被剥夺了它应有的权利，而且在文学中失掉了它的位置。那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不再有爱情描写。当时风靡全国、独领风骚近十年的革命样板戏，几乎都没有涉及爱情生活的内容，男人和女人之间除了同志关系和敌我关系之外，不再存在性别之间的关系。人们怎么也无法弄清江水英到底是已婚还是未婚，究竟有

没有丈夫，因为她总是独来独往，家中也别无他人。在诗歌园地里，爱情诗消失了，歌唱爱情的篇章只在日记和好友通信中顽强地生长着。在小说中，有关爱情的描写已很难见到，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只能作为手抄本在地下流传。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爱情已不属于无产阶级，而成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它与资产阶级情调划上了等号，成为与革命矛盾对立的東西。在政治斗争成为全国人民精神生活中的唯一内容的时候，文学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又怎么可能再去表现和讴歌爱情呢？

爱情的失落不是偶然的。它并不是被一下子禁绝的。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学中的爱情描写已经发生了变化。首先，爱情描写在文学作品中已经不能占据重要地位，而只能作为一种轻描淡写的点缀。其次，爱情描写必须是有前提的，有条件的：描写爱情决不应该是为了表现爱情，而是通过爱情描写来表现革命，表现重大的政治主题。通过男女之间感情关系的描写，或表现革命者闪光的灵魂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或揭示敌人的鄙下无耻和肮脏丑恶，或歌颂新的生活新的精神风貌，或暴露旧社会的黑暗。总之，爱情描写也承担了政治的使命，只有能够表现重大政治主题的爱情描写才是有价值的，否则便毫无意义。不能承担政治命题的爱情描写被逐渐排斥，为爱情而爱情的艺术表现因失去了它生存的土壤而无法生长。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这种爱情的失落现象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特定政治环境的产物。政治常常是决定一切的，但在政治决定下所产生的一切，却并不仅仅源于政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没有一定的基础和条件，政治就无法凭空创造出任何丰功伟绩，同样也形不成巨大的毁坏。政治唯一、题材决定的艺术主张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地在文学中驱赶了爱情，这与我们古老的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我们

的传统观念和受其支配的古代文学中，早就存在着一种对爱情戒备、警惕、蔑视的倾向。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关于男女之间关系的描写，有三种现象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种现象多见于历史演义小说之中。在那里，很少有男女之间的相互爱慕，很少有情与爱的表现，有的只是男人的荒淫和女人的引诱。在那里，女人是魔鬼，是祸水。如果沉溺于情爱之中，作为君主就要亡国，作为普通人也要误事。在这种描写中，爱情常常就是陷阱。它等同于美色，等同于淫乐，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领域。这是一种相当牢固的观念。纣王与妲己，幽王与褒姒，唐明皇与杨贵妃……几千年来一直被文学引为鉴戒。这其中体现的不仅仅是对女人的憎恶，而且是对爱情的恐惧。这种恐惧更多地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一种清醒的理性，与禁欲文化达到了契合。对于后来的作家来说，那种“祸水”的意象已经是禁欲文化的必然产物，已经是为了某种功利目的而作的一种自觉营造。它是为人们提供鉴戒、敲响警钟的“警世”、“喻世”之作，以恐怖故事劝戒人们（包括帝王）勿为女色所迷而沉溺于男欢女爱之中。

第二种现象是只有坏人才谈情说爱，英雄、清官、正人君子一般是不谈恋爱的。只有浪荡公子、风流女人、地痞流氓才干那种不要脸的勾当。这种现象在武侠、公案小说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英雄和清官不仅不谈恋爱，而且是专门惩办诛杀风流男女的。在这种故事中，有一种潜在的观念，即恋爱等于淫荡。如果说第一种现象中表现出的是对女性及恋爱的恐惧、戒备的话，这类小说则更多地表现出对女性的轻蔑及对爱情的厌恶。这类小说多写英雄，英雄则需要对女性表现出一种轻蔑，一种不屑一顾，需要不近女色，弃绝男女欢愉，绝无儿女情长。即使

《水浒传》这样的优秀名作也是如此。宋江杀惜、武松杀嫂、石秀杀嫂，漂亮女人都要被杀掉（除了孙二娘那样的母夜叉之外）。这里的女人们仍然是祸水，不同的是这些祸水遇到了不同的对手，在英雄面前，她们的魅力失败了。

在公案小说中，常见的模式是女人因偷情而害死丈夫，清官终于查明案情，杀死女人为男人报仇。这类小说中的女人也很坏，接触她们也是危险的。其实，第一类和第二类是一正一反。总之，风流女人都是祸水，在她们面前，如果立场不坚定，有情欲冲动，被她们迷惑，就要一败涂地。英雄和清官则能不为所动，不为所惑，而且能够将其剪除，为民除害。前者是警钟，而后者如武松者流都是榜样。

以上两种现象，都透露出一种观念：爱情与事业（大至社稷江山，小至个人前途）是冲突的。可见中国人喜欢把爱情与事业对立起来的做法不是什么新创举。西方人认为在每一件英雄业绩的背后都有一个女人，骑士为了爱情才去建立丰功伟绩；而在中国人的思维中，爱情却只会“坏我大事”。把爱情与革命事业对立起来的文学描写早在30年代就已经产生。

第三种现象是言情小说中爱情故事的伦理化倾向。这些作品的主要模式是落难公子与痴情女子的故事。在这种故事中，女人的出现常常是在男人失意落魄的情况下，给了男人种种抚慰和帮助。这些女人常常是圣母的形象。严格地说，这类故事中男女双方所构成的关系不是爱情关系，而是恩情关系。作家们所着力描写的也不是他们如何相爱，而是写他们如何有知遇之恩，男人在高中之后如何不忘恩负义。因此，这种爱情故事实际上已成为讲道德说仁义的工具。也许正因为如此，这种模式相当盛行。因为它找到了道德说教与爱情描写的统一点：虽有道德说教，毕竟表现了爱情，满足了读者的愿望；虽是表现爱情，却有道德说教，并无海淫之嫌。另外，在痴心女子与落

难公子的故事中，爱情与事业也找到了统一点：爱情不再与事业冲突，而是没有痴心女子的帮助就无法去建功立业，无法完成惊人之举。

这种写法一直流传着，至今仍然使某些作品在写爱情时附加上种种条件。

考察中国古代爱情诗的兴衰流变，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从《国风》中的爱情诗，到后来爱情诗的衰微和思妇诗的盛行，表现出的爱情伦理化的倾向，实际上是生活中的爱情逐渐被限制、被扼杀的反映。

这种倾向到了“文革”时期，终于同政治要求相结合，以“革命”的名义将爱情逐出了文学。

因此，新时期文学首先面临的的就是寻找失落的爱情。

二、对爱情位置的呼唤

新时期第一个发出这种呼唤之声的是刘心武。“四人帮”垮台不久，他就继《班主任》之后写了呼唤爱情的小说——《爱情的位置》。谁发出第一声呼唤并不重要，这种呼唤的使命落到刘心武的身上，是历史的偶然选择；但它要选择一个作家发出这种呼唤，却是必然的。当一场历史的荒诞剧谢幕之后，人们渴望着一切正常化。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中，给爱情以应有的位置，已是广大民众的心愿。正如姑娘们已经悄悄穿起了花裙子，呼唤着服装打破“灰灰黄黄”的单一色调一样。读者也不愿文学只是板着面孔讲政治。尽管如此，《爱情的位置》这篇小说还是值得讨论的。因为它不仅发出了呼唤之声，而且提供了当时这个问题的时代面影。作为历史的留影，它再现了那个时期青年对于爱情的初步思考和历史遗留的困惑，并且显示着当时作家一种非常滑稽的但却又是必须的思维方式和论辩方式。

小说的女主人公孟小羽作为一个年龄已不小的姑娘，由于认识了一个男青年而对爱情陷入了思考。她所思考的也就是当时作者所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在我们革命者的生活中，爱情究竟有没有它的位置？应该占据什么样的位置？”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关于爱情究竟有没有它的位置，孟小羽是这样思考的：“前几年，我曾纳闷过，为什么我们的银幕、舞台上，不但丝毫没有爱情的表现，而且，甚至极少夫妻之间同台的场面，掐指一算，鳏寡孤独之多令人吃惊。”“我是在这么一种气氛里从一个小学生长到现在这个模样的。比如说，连舞剧《白毛女》，人们也总是跟我们解释，大春和喜儿之间只有一般的阶级感情，谁要把他们看成一对未婚夫妻，谁就是修正主义。”这大概是刘心武的发现，而且通过孟小羽已认识到了“把爱情问题驱逐出文艺作品乃至一切宣传范畴的结果，是产生了两种不正常的现象。一种，是少数青年把生理上的要求当作爱情，个别的甚至堕落成流氓。另一种，可就非常普遍了——不承认爱情，只承认婚姻。”象当时的大多数小说一样，形象的设计只是为论点提供论据的。小说中的亚梅就是一个不知爱情、只知婚姻的女青年。她讲究的是对方有什么家具，有多少存款等条件。在她的心目中，对象、爱人、结婚、登记这些词汇都是合法的，正当的，而“爱情”这个字眼即使不一定宣判为“流氓语汇”，至少也含有点落后、可耻的色彩，如果说出口，是要“丢死人”的。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这样一个亚梅，而是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认识。小说中的魏师傅对小羽非常关心，但他关心的也仅仅是小羽该找个对象而已。

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孟小羽也自然有了这样的怀疑：“也许，一个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是应当自觉摒弃爱情的，在他或她的心目中，永远不许爱情占有一席位置。”带着这样的疑问，作家让她去请教了一个老革命，让这个老革命现身说

法：“革命者也应该有爱情。否认爱情在无产阶级革命者生活中占有的重要位置，这才是修正主义……”以老革命的身份把这个问题肯定下来，也许只有那个时期才有这样的论辩方式。

关于第二个方面，作品也是借老革命之口回答的：“我认为，爱情应当建筑在共同的革命志向和旨趣上，应当经得起斗争生活的考验，并且应当随着生活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提高……当然，性格上的投合，容貌，风度的相互倾慕，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当一个人为了爱情而忘记革命的时候，那便是把爱情放到了不恰当的位置上，那就要堕入资产阶级爱情至上的泥坑，甚至作出损害革命的事来。当一个人觉得爱情促使他更加热情地投入工作时，那就是把爱情放到了恰当的位置上……”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篇小说显然太简单了，它除了呼唤爱情的位置，别无他物。由此可见新时期文学在这个问题上的起点是多么低。这不怪作家，现实决定了作家无法建筑起他的空中楼阁，即使建起了也无法为社会和读者所接受。而且，它所呼唤的爱情，还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还是服从于革命需要的爱情，还是纯精神的理想的爱情。老革命干部冯姨在延安时就失去了爱人，但却守着丈夫的照片直到死而没有改嫁，并且在日记本上给丈夫写信。这种古典主义的深情在稍后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中达到了极致。

对爱情位置的呼唤一呼百应，迅速发展起来。文学创作中出现了大量的爱情描写，很快成为一股不可遏制的潮流，刹时形成一种新的风气，大有不写爱情就不成其为文学之势。在一种新鲜感的刺激之下，人们竞相编写爱情故事，爱情成为一种时髦，以至于让一些人感到文学已目不忍睹，只好闭上眼睛摇头叹气：拥拥抱抱，何其多也！

三、爱神归来之后的政治反思